

辽上京皇城和宫城城门遗址浅析

汪 盈^{1, 2} 董新林¹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市 100710; 2.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市 102488)

关键词: 辽上京; 皇城; 城门; 辽金

摘要: 辽上京遗址是辽代最为重要的首都, 由北面皇城和南面汉城组成。辽上京考古队对辽上京皇城和宫城城门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 获得一批重要的考古资料。本文概述并初步分析了辽上京皇城和宫城城门的形制和类型, 并对其形制规模与等级、门道基础做法和营建規制等进行了初步探讨, 认为辽代城门已形成特有的規制。

Keywords: The Upper Capital of Liao Dynasty; Imperial City; City Gate; Liao-Jin Dynasties

Abstract: The upper capital of Liao Dynasty, consisting of the imperial city in the north and, in the south, the city where Chinese populace resided, used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capital in its era. After scientific excavations on the site of the imperial city and remains of the palace gates, a team of archaeologists obtained a number of important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In this article, there is a brief description and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shapes, structures and types of the gates of the imperial city and palace gates in the upper capital of Liao Dynasty, and an elementary probe into the scales, grades, doorway foundation construction methods and construction regulations of above gates. It is believed that, in Liao Dynasty, a unique set of regulations and rules appli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ity gates had already formed.

DOI:10.16143/j.cnki.1001-9928.2018.06.005

契丹辽帝国以内蒙古赤峰地区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为中心, 其盛时疆域范围北抵克鲁伦河流域, 一度到外兴安岭一线, 东临日本海, 西到阿尔泰山附近, 南达河北高碑店白沟一线的广大地区。契丹辽帝国曾设有五京。《辽史·地理志》载: “太宗以皇都为上京, 升幽州为南京, 改南京为东京, 圣宗城中京, 兴宗升云州为西京, 于是五京备焉。”^[1]

辽上京是辽朝营建最早、使用时间最长、最为重要的首都。始建于神册三年(918年), 辽天庆十年(1120年)金兵占领辽上京, 辽上京作为都城逐渐废弃^[2]。辽上京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东南, 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为了推进对以辽上京为代表的辽代都城制度的深入研究, 促进地方政府对辽上京遗

址进行更为有效保护, 同时, 为辽上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等提供科学的考古资料, 在国家文物局有关领导和学者的大力支持下,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和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辽上京考古队, 从2011年开始对辽上京皇城遗址进行有计划科学发掘, 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考古新发现。

《辽史·地理志》记载, 上京“其北谓之皇城, 高三丈, 有楼橹。门, 东曰安东, 南曰大顺, 西曰乾德, 北曰拱辰。中有大内。内南门曰承天, 有楼阁; 东门曰东华, 西曰西华。此通内出入之所。”^[3]由此可知, 辽上京皇城有4座城门, 宫城有3座城门。

根据考古调查和影像资料可知, 辽上

京城址平面整体呈“日”字形，由北部的皇城和南部的汉城两部分组成，总面积约5平方千米。位于北部的皇城城墙地表遗迹保存较好，整体形制保存基本完整，平面呈不规则方形，其中西墙南、北两端略折。除皇城南墙局部已被沙力河洪水破坏外，皇城东墙、西墙、北墙近中部，都发现有缺口和瓮城，可以确认为东门（安东门）、西门（乾德门）和北门（拱辰门）。三座门址地表遗迹清晰。而位于皇城内的宫城城墙，几乎无法辨认出地表遗迹。根据2013~2015年的考古勘探和发掘成果可知，宫城位于皇城中部偏东，平面略呈长方形，宫城东、南、西三面城墙各发现一个较大缺口，推测为东门（东华门）、南门（承天门）和西门（西华门）。勘探未发现北门。从2011年至2016年，辽上京考古队对皇城东门和西门遗址，宫城东门、西门和南门遗址进行了考古试掘或发掘，积累了一批重要的考古资料。本文择要对辽上京皇城和宫城门址进行概述并做初步梳理，请方家斧正。

二

辽上京皇城共有4门。其中北门（拱辰门）为现代道路叠压；南门（大顺门）被沙力河冲毁，位置不详。根据既定的学术目标，辽上京考古队对皇城西门和东门遗址先后进行了发掘或试掘。

西门（乾德门）位于皇城西墙的中部偏北，由城门和瓮城组成。城门墩台及城门外侧的瓮城格局保存情况较为完好^[4]。城门遗址由南北两侧的夯土墩台、单门道及其路面和内侧的登临马道等组成。根据门道内外倒塌的砖瓦堆积推测，城门之上原应有城楼建筑。根据发掘资料可知，城门至少经过三次大规模营建。第一次和第二次营建城门的规模较大，墩台范围较清楚，进深约29

米。其中第二次营建的城门门道方向为东偏南19°。门道夯土基槽深约3米。门道基础保存好。门道南北两侧尚存较为完整的石地袱，其上残存木地袱，木地袱卯口上立木排叉柱。石地袱东西总长19.90米，门道宽（地袱石之间距离）约6.20米。门道内发现有多层路面，中部保存有较好的石门限，北侧有一块完好的门砧石，原来应设双扇版门。门道内中部略高，两端略低。城门北墩台（南墩台未发掘）内侧发现登临马道。第三次营建的城门规模体量明显变小。门道方向也略有改变，约为东偏南21°。墩台四角均发现安置石角柱的槽石，其中西北角的石角柱尚存，收分斜率与墩台墙面相同。北墩台保存较完整，东西长19.90米，（西壁）南北宽8.73米。墩台西壁底部在夯土上铺条石，其上包砖。门道中部残存一段木门限，其北侧存一门砧石，原来应设双扇版门。门道基础南侧被现代道路破坏，仅残存北侧的部分石地袱，及其上的木地袱和排叉柱遗痕。根据发掘资料推定，第一、二次营建的城门属于辽代，第三次营建属于金代。

瓮城遗址平面呈马蹄形，东西内长约26.40米，南北内宽约22.80米。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可知，瓮城遗址由瓮城墙和瓮城门组成。瓮城墙经过三次大规模营造。瓮城门有一个门道，朝南，位置有一次大的变化。瓮城始建应与城门第一次营建大体同时。墙体宽8~10米。瓮城城门位于南侧，宽约5.84米，南北进深约8米。门道基础为在石柱础上放木地袱，上立排叉柱。夯土壁面有木板护墙残迹。第二次修筑瓮城，当与城门第三次营建时间相当。城墙有修补，门道位置向东偏移。门道夯土豁口残宽约6.70米。不见门道基础。第三次修筑瓮城，属于此城使用的最后阶段。此时的瓮城广场中心，发现四块竖立成排的大板石，中部有圆孔，下部深埋在

夯土槽内。四块大板石东西成排,南北向竖立,与瓮城门道方向相对,应是与瓮城城门相关的建筑设施构件。

东门(安东门)位于皇城东墙的中部,由瓮城和城门组成^[5]。辽上京考古队于2015年仅对皇城东门遗址进行了试掘。根据试掘资料可知,辽上京皇城东门为木过梁式城门,南北宽23.70米(两侧立壁间的距离),由两侧墩台、东隔墙、西隔墙和三个门道组成。其中,中门道被严重破坏,南、北两个门道保存较好。每个门道宽约4.50米,进深不详。门道内残存烧毁的木构梁柱等遗物。门道基础做法为石地袱做底,上垫木地袱,其上立排叉柱。这种门道基础做法与辽上京皇城第二次营建的西门遗址、辽祖陵黑龙门遗址^[6]的形制结构一致。金朝占据辽上京后,继续使用皇城东门,但封堵了南北两侧的门道,仅存中间门道继续使用。这反映了从辽代都城到金代地方城的城门形制规模的沿革。

新发现的辽上京宫城遗址共确认东、南、西三门,均进行了科学的考古发掘。现简述如下。

辽上京宫城东门(东华门)遗址^[7]坐西朝东,方向为东偏南14°,与皇城东门相对。基址上部被破坏,仅存底部基础。但是我们通过精细的考古发掘,根据建筑残迹可确认辽上京宫城东门是一座东向的殿堂式城门。城门建筑的台基呈长方形,南北面阔31.20米,东西进深13.10米。城门遗址由夯土台基及其基槽、22个礅墩和东侧慢道等几部分构成。城门建筑的柱网结构平面仍保存完整,面阔共七间,其中当心五间的进深为等距的两间,即《营造法式》所载“分心槽”地盘布局^[8]。当心间、次间和稍间面阔基本相等,尽间面阔较小。推测当心间和两侧稍间外有慢道,即共有三间作为出入通行门道。这种殿堂式城门的建

筑形制在唐长安大明宫内重门遗址^[9]和渤海上京皇城南门遗址^[10]都有发现。

通过考古发掘和关键位置解剖,可以确认宫城东门遗址的建筑营造次第。辽上京宫城东门遗址的现存基础部分共发现8块夯土及其相应的基槽,按照由早及晚的营建次序编号为夯1~夯8。宫城东墙及东门均在生土上开槽而建,是此地最早的始建建筑。营建宫城东墙时,首先有计划地预留出宫城东门的缺口,在缺口两侧分别下槽(夯1槽)并夯筑宫城东墙(夯1)。其次,开始下挖东宫门基槽(夯2槽)。在与东宫墙衔接处,城门基槽局部打破城墙基槽。然后夯筑城门台基(夯2)。在夯土台基下挖出较深的礅坑,以夯土和石块、砖瓦残块等相间夯筑礅墩,作为建筑柱网结构的节点承重基础。第三,在东宫门、东宫墙衔接处补筑相关设施(夯3、夯4)之后,在城门两侧生土面上营建夯土地面(夯5)。之后,很可能在城门东侧夯筑三条长斜坡慢道(夯6),以供车马从城门内通行。在城门使用过程中,曾对当心间夯土台基、城门西侧地面、台基北侧进行修补夯筑(夯7、夯8)。

宫城南门(承天门)位于宫城南墙中部略偏西,由东、西两侧的墩台、中间的单门道和登临墩台的内侧(北侧)马道三部分组成^[11]。夯土墩台保存较好,各面边壁包砖。西墩台南北长11.80米,东西宽6.70米,最高残存约3.30米。墩台中间设单门道,宽约7.80米。原位保存有将军石、石门限和门砧石等设施。将军石东段石门限上存有两道较深的沟槽,与路土上的车辙痕迹相连。门道两侧城门基础作法为石柱础上铺木地袱、上立排叉柱。石柱础每侧6个,即城门门道进深5间。在门道中央将军石南侧,发现一个祭祀坑,坑内发现两副狗骨架和两件羊头骨。马道紧贴城墙北侧而建,外侧边壁包砖,底部

包石。根据夯土遗迹和门道内外倒塌的砖瓦堆积,可知城门之上建有木构门楼建筑。我们在西墩台残存的夯土台面上发现4个柱洞,即墩台上的木构门楼建筑或其平坐采用永定柱做法,可能为进深三开间的柱网布局。根据层位关系和出土遗物,宫城南门第一次营建应在辽代早期;第二次增设墩台和木构门楼,可能与《辽史·地理志》所载辽太宗“辟承天门”有关^[12]。辽上京宫城南门及宫城墙在金代完全被小房址所叠压,宫城格局已彻底废弃,仅南门大街(一号街道)继续沿用。

宫城西门(西华门)位于宫城西墙中部,与皇城西门相对。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可知,西门有两次重要的营建^[13]。第一次修筑城门是在城墙之间留有缺口。仅在城墙两侧中部各发现一个大础石坑。第二次营建的城门由两侧的墩台和中间的门道两部分组成。夯土墩台保存较差,中间设单门道,宽度约6.40米。门道内尚存将军石、局部地袱石、路面等建筑基础遗迹。根据遗迹和遗物推断,宫城城门毁弃后,金代仍有东西向道路遗迹,并先后有依宫墙残迹而建的房址、跨宫墙残迹而过的院墙等晚期遗迹。

三

根据辽上京皇城和宫城门址的概述可知,这5座已发掘的城门遗址按建筑结构可分为殿堂式城门和木过梁式城门两大类。殿堂式城门以宫城东门遗址为代表;其他门均为

木过梁式城门。其中木过梁式城门根据门道数量的不同,可分一门三道城门和单门道城门两类。一门三道城门仅见皇城东门遗址;单门道城门见于皇城西门、宫城南门和西门遗址。

上述的辽上京皇城和宫城门址分类列表如下。(表一)

(一) 门址形制规模和等级

辽上京皇城遗址考古发掘工作持续了七年,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考古新发现。其中最为重要的成果有两个。其一是首次发现并确认了宫城的四面城墙和3个城门遗址,从而搞清了宫城的准确范围和主要布局;其二是首次发现并确认了辽上京皇城遗址的东向中轴线。这两项重要的成果,都与城门遗址的形制规模密不可分。

辽上京宫城东门是一座殿堂式城门,为一门三道的形制。而宫城西门和南门,均为木过梁式单门道城门。显然宫城东门在宫城门中具有较为特殊的形制,等级最高。从皇城城门来看,皇城东门也是三门道过梁式城门,而皇城西门和皇城北门^[14]均为木过梁式单门道城门。可知皇城东门在皇城中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因此可以推测辽上京皇城东门、宫城东门应为正门。参考汉长安城、隋唐长安城和北宋东京城等考古资料可知,辽上京皇城和宫城东门都是三门道形制,体现了作为都城正门的营建规制。

根据辽上京考古队的发掘资料可知,在主要街道方面,辽上京皇城东门内大街宽度

表一 辽上京皇城和宫城门址分类表

	一门三道	单门道	门道基础	
			A型	B型
殿堂式城门	宫城东门			
木过梁式城门	皇城东门	皇城西门		石地袱、木地袱、排叉柱
		宫城西门		石地袱、木地袱、排叉柱
		宫城南门	石柱础、木地袱、排叉柱	

不少于40米^[15]，皇城南门内大街宽度仅为20米左右^[16]。东门大街的宽度至少是南门大街的2倍。更重要的是，在宫城东门之内，发现3组大型的宫殿院落，沿皇城东向轴线呈对称分布。但是，在宫城南门之内的南向轴线上，却未见大型建筑。地表保存较好、地势较高的南向建筑院落，其位置是在宫城西北角而非南向轴线上。由此可以确认辽上京皇城的朝向为东向。

结合以往的考古发掘和解剖资料，辽上京的宫城东门始终沿用始建形制，宫城西门和南门的城门形制虽然可能有所变化，但是单门道的格局一直未变。皇城门和主要街道在辽代也基本继承了辽上京始建时的格局。因此，从目前的考古发掘成果来看，辽上京皇城东向的城市布局在辽代没有发生变化。金代占领上京之后，皇城格局沿用，但皇城内的辽代宫城格局完全废弃，重新进行规划建设，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变。

（二）门道基础做法和辽代城门营建規制

辽上京皇城和宫城门址，木过梁式城门的门道基础，根据做法的差异，可分为两型。

A型：石柱础，上置木地袱，立排叉柱。

B型：石地袱，上置木地袱，立排叉柱。

其中A型门道基础，以宫城南门、皇城西门瓮城门遗址为代表。B型门道基础以皇城东门和西门遗址，宫城西门遗址为代表。

城门门道基础的做法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傅熹年先生曾对汉唐宋元都城城门门道做法进行过论述。“根据遗址，参考前述绘画资料，推定为在方形石础上立矩形断面柱子，最外一根柱向内倾斜，其斜度平行于城墩表面。柱上顺城门道方向架承重枋，左右二枋间跨门道架梯形构架，构架上铺木板，板上夯土直至墩顶。门道两端施博风板。”因为考古发掘的城门门道上部都已被破坏，

具体情况只能做些复原推测。但是，汉唐辽宋时期城门门道下部基础部分有些保存较好，为研究提供了第一手实物资料。傅熹年先生对城门“门道基础做法”进行了总结分类。指出“据现有材料，汉、唐以来至元代，这种门道下部做法可分三型。I型：用石柱础，础上用木地袱，袱上立木柱。II型：用方形石础，础上立柱。III型：用土襯石，石上用石地袱，袱上立木柱。由历史发展上看，汉长安城门属于I型。南北朝城门尚未发现实例，但与之同时而受其影响的朝鲜高句丽时代的平壤罗城城门属于II型。据此，可能我国南北朝时也出现II型。近年发掘出的唐长安、洛阳城门均属II型。但在敦煌发现的绢画中也有I型的例子，说明唐代I、II型并行。宋、元以来，据《营造法式》规定及前引诸宋、元画所示，多属于III型”^[17]。

根据考古新发现的资料，在汉唐时期的城门遗址考古发掘资料中找到一些实例，来对傅熹年先生的总结分类做些补充说明。I型以汉长安城东墙南侧的城门——霸城门^[18]为代表。霸城门实际是长乐宫的正东门，其城门采用“一门三道”規制。北门道和中门道被破坏，南门道保存较好。其门道基础做法为，门道地面两侧放置不规则的石柱础，石柱础有的紧密相连，有的之间有空隙；石柱础之上置两排木地袱（原报告称“枕木”）；在内侧木地袱上置立木排叉柱。汉长安城南侧的城门——西安门的东门道和中门道保存较好。门道基础做法与霸城门相同。唯一的差别是柱础石下部半埋在夯土中，础石表面与门道地面取齐。II型以唐代长安城皇城南墙西侧的含光门^[19]和唐代洛阳郭城南正门——定鼎门^[20]为代表。含光门为“一门三道”規制。其门道基础做法为，门道两侧安置排列整齐的方形石柱础，础石顶面中央凿有圆形榫眼，上立木排叉柱。两础石

(中至中)之间距1.30米。定鼎门也是“一门三道”规制,隋代始建,沿用到宋代。其唐代门道基础做法为,承础石埋在门道底部的夯土中。门道两侧分别安置长方形或方形石柱础,两础石间有的紧密相连,有的略有空隙;石柱础顶部正中,均凿有立木排叉柱的圆形榫眼。有后来补凿浅榫眼的迹象,发掘者认为是盛唐后期所为。III型以宋代洛阳城东城东墙上的城门——宣仁门^[21]为代表。宣仁门为“一门三道”规制。其南门道基础做法为,门道南壁底部安置土衬石;土衬石之上置有长方形石地袱,长0.40~1.20米,宽0.55米;石地袱顶面凿有长方形榫眼,上立木排叉柱。

根据上文的认识可知,辽代城门的A型门道基础做法,与汉长安城霸城门和西安门做法一致;而B型门道基础做法是在承袭汉唐城门制度的基础上,形成辽代自己的规制。推测辽代城门的门道基础做法的规制,在辽朝的控制范围内得到较好的贯彻执行。根据目前发现的辽代门址资料可知,巴林左旗辽祖陵黑龙门遗址^[22]、祖州城内城南门(兴圣门遗址)^[23]、蒙古国布尔干省南部达辛其楞苏木的青陶勒盖古城(Chintolginbalgas)是一座东南向的辽代城址(疑似辽代“镇州”)^[24]等,都属于B型门道基础做法。

辽代门道基础做法秉承了汉朝和渤海使用木地袱的传统,将石地袱和木地袱结合,开启了有辽一代独具特色的建筑规制。这不仅为中国古代陵门建筑模式增加了新的实例,而且也为古代门制考古研究和古建筑复原研究等提供了珍贵资料。

[1] 脱脱,等. 辽史:地理志一:上京道. 北京:中华书局,1974:438.

[2] 董新林. 辽上京城址的发现和论述. 北方文

物,2006,(3).

[3] 同[1]:441.

[4] 董新林,陈永志,汪盈,康立君,肖淮雁. 辽上京城遗址首次大规模考古发掘乾德门遗址. 中国文物报,2012-01-20(8).

[5] 董新林,陈永志,汪盈,肖淮雁,左利军. 辽上京城址首次确认曾有东向轴线. 中国文物报,2016-05-6(8).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辽祖陵黑龙门遗址发掘报告. 考古学报,2018,(3).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宫城东门遗址发掘简报. 考古,2017,(6).

[8] 李诫,著. 营造法式:卷第三十一:大木作制度图样下. 梁思成,注//梁思成全集(卷七).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9]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唐长安大明宫.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10]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渤海上京城:1998~2007年度考古发掘调查报告.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图版九三.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的考古新发现. 考古,2017,(1).

[12] 同[1]:440,441.

[13] 董新林,陈永志,汪盈,左利军,肖淮雁,李春雷. 考古发掘首次确认辽上京宫城形制和规模. 中国文物报,2015-02-04(8).

[14] 根据2013年辽上京考古队的考古钻探资料.

[15] 同[11].

[16] 董新林,陈永志,汪盈,肖淮雁,左利军. 2013年辽上京皇城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收获. 中国文物报,2014-02-14(8).

[17] 傅熹年. 唐长安大明宫玄武门及重玄门复原研究//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集.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235~261.

[18] 王仲殊. 汉长安城城门遗址的发掘与研究. 考古学集刊(第17集).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24页图14,图版26.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 唐长安皇城含光门遗址发掘简报. 考古,1987,(5).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洛阳市文物工作队. 定鼎门遗址发掘报告. 考古学报,2004,(1).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 河南洛阳

隋唐城宣仁门遗址的发掘. 考古, 2000, (11). 参见第44页图四和图版陆. 据悉此城门应为宋代城门遗址。

[22] 同[6].

[23] 島田正郎. 祖州城: 东蒙古モンチヨックアグラに存する——辽代古城址の考古学的歴史学的发掘调查报告. 中泽印刷株式会社刊, 1955.

[24] a. 宋国栋. 辽代镇州城地理位置考辨.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2017, (1).

b. 宋国栋. 蒙古国青陶勒盖古城研究. 内蒙古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

c. 巴图. 蒙古国辽代城址的初步研究.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责任编辑: 辛 革 刘亚玲)

(上接21页)

时, 在丹凤门的東西两侧430米、415米处的城墙(也是南宮墙)上, 还辟建了望仙门、建福门, 以便文武大臣进出宮城。上述历史背景说明, 丹凤门不设双阙是有主观和客观(利用外郭城北城墙)两方面原因的。

但是, 由于主要宮城的地位, 大明宮的设计者还是采取了“堤内损失堤外补”的方式, 选择在大明宮含元殿设置双阙, 以满足宮城礼制上的需要。含元殿以及东西阙楼的整体建筑虽然不是宮城之门, 但发挥了像承天门那样的宮城门阙的礼仪作用, 弥补了丹凤门未设双阙的缺憾。关于这一点, 著名的古建专家已经有所论述^[6]。

综上所述, 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 隋唐长安城城门遗址的考古资料日渐丰富, 使得城门形制特点、演变发展以及若干问题的认识得到了深化和澄清, 有效地推动了隋唐长安城都城遗址的考古学综合研究。

- [1] a.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 考古学报, 1958, (3).
b.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唐长安大明宮.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9.
c.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 唐代长安城考古记略. 考古, 1963, (11).

d.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队. 唐代长安城明德门遗址发掘简报. 考古, 1974, (1).

e.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 唐长安皇城含光门遗址发掘简报. 考古, 1987, (5).

f.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 陕西唐大明宮含耀门遗址发掘记. 考古, 1988, (11).

g.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队. 西安市唐长安城大明宮丹凤门遗址的发掘. 考古, 2006, (7).

h.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 西安市唐长安城大明宮兴安门遗址. 考古, 2014, (11).

[2] a.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 考古学报, 1958, (3).

b. 赵雨乐. 唐玄宗政权与夹城复道.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2004, (1).

[3] 刘庆柱. 古代门阙制度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氏著. 古都问道.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256~277.

[4] a. 明德门遗址的最新考古资料现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队.

b. 杨鸿勋先生曾根据洛阳定鼎门遗址发掘结果, 认为明德门也应有类似的阙楼, 并画出了复原平面图。[唐长安明德门复原探讨. 文物, 1996, (4).]

[5] 杨鸿勋先生认为丹凤门也应有阙楼, 也画出了丹凤门阙楼复原平面图。(大明宮.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3: 188~190, 图3-23.)

[6] 傅熹年. 唐长安大明宮含元殿原状的探讨. 文物, 1973, (7).

(责任编辑: 方燕明)